

Research on the Spreading Mechanism of Ancient Rumor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Value-added Theory —Take “Soul Stealing” as an Example

Zhu Min

Abstract: As a collective action in concept or public opinion, rumors are easy to lead to large-scale action results. This paper takes the “soul stealing” event in 1768 described in Philip Alden Kuhn's book “soul steal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mbs the spread process of rumors in the “soul stealing” event and analyzes the spreading mechanism of ancient rumor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value-added theory. This study holds that the emergence and large-scale spread of “soul stealing” rumors are the result of the continuous accumulation of the “value” of six factors, such as the structural conduciveness of the social background, the structural strain of the people, the generalized belief in witchcraft, the trigger of dramatic events, the mobilization for action of emperor and officials, and the failure of social control. Therefore,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mor spreading in modern socie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rum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uch as improving public media literacy, eliminating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official and folk, and grasping effectively the opportunity of rumor refutation.

Key words: “Soul Stealing”; Ancient Rumors; Spreading Mechanism; Value-added Theory

价值累加理论框架下古代谣言传播 机制研究

——以“叫魂”事件为例

朱 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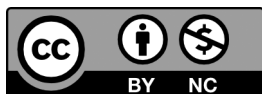
摘 要：谣言作为观念上或舆论上的集体行动，容易引发大规模的行动结果。本文以孔飞力教授的著作《叫魂》中描述的1768年“叫魂”事件为研究对象，梳理“叫魂”事件中谣言的传播过程，在价值累加理论框架下分析古代谣言的传播机制，认为“叫魂”谣言的产生与大规模扩散是社会背景的结构性诱因、民众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紧张、对妖术的一般性信念、戏剧性事件的触发、皇帝和官员的清剿行动、社会控制失效等六个因素的“价值”不断累加促成的结果。由此结合现代社会谣言传播的特点，提出了应提高公众媒介素养、消除官方与民间的信息不对称、高效把握辟谣时机等谣言防控的建议。

关键词：“叫魂”事件；古代谣言；传播机制；价值累加理论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谣言，几乎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存在。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即在其《谣言》一书中将谣言称为“世界最古老的传媒”。谣言借由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潜藏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难以察觉，但其破坏力却不容小觑。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教授在其代表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即描述了一种被称为“叫魂”的妖术谣言在1768年席卷大半个中国的传播案例。这场“叫魂”事件让小民百姓、各级官员乃至一国之君都卷进妖术谣言的恐慌之中。

然而在乾隆下令的清剿行动折腾了数月后，真相终于浮出水面：所谓的叫魂妖术，不过是口耳相传的子虚乌有的谣言，不存在妖术和妖人，有的只是造谣诬陷和清白之冤。这场妖术大恐慌以乾隆皇帝不得不下旨停止清剿而告终。

鉴于谣言对社会的重大影响，谣言研究历来被各领域学者所重视。学界对“叫魂”事件中的历史、政治、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力作不在少数，但传播学领域解读“叫魂”谣言的研究并不多，且其中大多研究的理论框架多采用著名的“谣言公式”—— $R=I \times A$ （谣言的强度 = 信息的重要程度 \times 信息的不透明程度），研究趋于同质化。然而作为一个经典的谣言传播案例，“叫魂”谣言的产生及扩散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结构性因素，远不止于简单的科学公式^①。既为“盛世”，何以妖术盛行？“叫魂”谣言的传播实则作为一种集群行为，价值累加理论为“叫魂”谣言传播提供了归因路径，结构性诱因、结构性紧张、一般性信念、触发因素、行为动员、社会控制不足等六个条件的价值不断累加促成“叫魂”谣言扩散。在价值累加理论框架下系统梳理“叫魂”谣言的传播过程，对我们深刻理解古代谣言传播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便于认识不同社会背景下谣言传播的特殊性和共性，这对现代社会谣言防控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谣言传播与集体行为理论

（一）谣言及“叫魂”事件中的谣言传播

到底什么是谣言？众多学者和权威著作对此多有阐述。《现代汉语词典》对“谣言”一词的释义是“凭空捏造的，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消息”^②。学者刘建明认为“谣言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事实描述，并带有诽谤的意见指向”，这个意义上而言，谣言的性质不是中性的，“而是攻讦性的负面舆论”^③。学者周裕琼则把谣言称为“未经官方证实却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对现实世界的假设，它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性说法，帮助人们解读当前模糊而重要的情境”^④。由此，对于谣言具有模糊性、传播性、目的性等特点，学界的看法较为一致。

“叫魂”事件中的谣言是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自己服务^⑤。1768年乾隆年间，这种妖术谣言突然在中国爆发，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从早春到晚秋的大半年里，小民百姓人人自危，充满焦虑与恐慌，视来路不明的陌生人为威胁；官僚们前期妄图息事宁人，后

① 胡翼青. 流言传播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以“叫魂”和“非典”为例[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8(3): 44-49.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③ 刘建明. 谣言的形成与控制[J]. 采写编, 2003(3): 2.

④ 周裕琼. 当代中国社会的网络谣言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⑤ 孔飞力.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 陈兼, 刘昶,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 1.

期在圣意下不得不根据“传言”四处追捕并不存在的妖物；乾隆皇帝则怀疑事件背后有叛变阴谋，下旨指挥全国发动清剿，乃至令“叫魂”谣言愈演愈烈。

（二）集体行为及价值累加理论

集体行为一般是指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区别于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社会运动”^①。谣言作为观念上或舆论上的集体行动，借助于熟人间的高度信任、情绪感染与从众效应，更易引发大规模行动效果^②。

20世纪60年代，斯梅尔赛在《集体行为的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价值累加理论（Value-added theory）。他认为集体行为的“充要条件”分别为结构性诱因（Structural conduciveness）、结构性紧张（Structural strain）、一般性信念（Generalized belief）、触发因素（Precipitating factors）、行动动员（Mobilization for action）和社会控制的疏忽或失效（Failure of social control）。他认为，集体行动实质上是人们在受到威胁、紧张压力的情况下，为改变自身的处境而进行的尝试。所有的集体行为都是由多个因素相互作用产生的，某个因素的出现也许不足以产生群体性事件，但当多个因素出现时，它们的价值就会被放大，群体性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在多个变量引起的社会失范现象中，结构性诱因是集体行为产生的现实空间；结构性紧张孕育着社会风险；人们容易对特定处境形成某种共同感受，产生普遍情绪和共同信念；触发因素的作用即通过与结构性紧张产生共鸣，推动集体行为的发生；群体情绪在群体规模扩大中相互感染，通过领导或自发地完成动员过程；在危机的临界点，社会控制能力如果失效，集体行为将难以避免。

二、事件回顾：“叫魂”谣言的传播过程

（一）谣言的生成期

1768年，正值传统史家眼中的“乾隆盛世”。“叫魂”事件的第一个案子，是发生于该年1月的德清石匠吴东明案。德清是位于浙江的县城，这一年，石匠吴东明承接了一桩城墙水门重修工作。农夫沈士良在此期间前来拜托吴东明，请求他将写有沈氏两个可恶侄子姓名的纸片贴在木桩顶部锤入水底——这种做法人们称之为“叫魂”。吴石匠并没有照做，他无疑早有耳闻这些“叫魂”谣言，他害怕自己被牵扯进来，于是将沈氏扭送至县衙处置。然而随后，因为

① 赵鼎新. 清华社会学讲义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② 郭小安, 董天策. 谣言、传播媒介与集体行动——对三起恐慌性谣言的案例分析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3, 9(35): 58-62.

叫魂妖术引发的恐慌，浙江民间发生了一些不安宁之事。不到两周，关于叫魂的各式谣言便流传到了邻省江苏。谣言初期，各级官员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也为了不惊动皇帝，力图息事宁人，但一系列的敷衍作法并没有打消民众心中的恐惧。

（二）谣言的扩散期

“叫魂”谣言，从江南地区迅速蔓延到山东、湖广、北京、安徽、河南、陕西及福建。这一阶段，地方官僚仍试图将“叫魂”案相关消息封锁，规避上报的麻烦。受当时经济危机的影响，普通民众出于生存压力而缺乏精神上的安全感，对周遭的风吹草动都十分紧张防备。民众出于自保，对像游僧、乞丐这样素不相识不知根底的陌生人充满敌意，甚至滥用私刑处死他们判定为可疑者的无辜人。另一方面，乾隆皇帝通过内线获得了各地妖术恐慌的消息，因为一直以来困扰他的满汉对立问题，他怀疑“叫魂”背后或许有叛乱阴谋，于是下令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清剿。自此，“叫魂”谣言非但没有被遏制，反而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在全国爆发。部分官员在君主意志的压力下，滥捕滥刑，让无辜百姓屈打成招。处于恐慌中的普通民众也获得了微观权力的幻觉，任何人都可以指称别人为叫魂犯。“叫魂”谣言彻底让公众陷入了歇斯底里。

（三）谣言的衰退期

如果说“叫魂”谣言的生成是自下而上的传播行为，那么其衰退则是自上而下的控制行为。当妖术谣言大肆扩散时，乾隆皇帝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热忱展开调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剿成了皇帝与各省官僚之间的暗中较量。作为清剿行动的推动者，军机大臣们在对各叫魂案件线索反复审查研究后，他们意识到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冤案。面对如此尴尬的处境，他们也只能也必须拿出道德勇气向皇帝谏言事情的真相。为了让局势不至于更加恶化，乾隆最终下令停止清剿，也对清剿行动中借机闹事的官员做了清算。这场因虚无的谣言而起的闹剧终于接近了尾声，民间对叫魂谣言的关注热度逐渐消退。

三、价值累加理论框架下“叫魂”谣言的传播机制

（一）结构性诱因：乾隆治下的镀金时代

斯梅尔塞认为，集群行为的发生一定是基于有利的结构，这些结构包括基础性社会背景和环境条件。“叫魂”事件爆发于1768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当时正处于为人称道的“盛世”顶端，且谣言的发端在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成就是以国内和平为基础的。有研究显示，在整个十八世纪的过程中，

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至1794年达到三亿一千三百万左右^①。与此同时，国外白银和铜大量进口到中国以支付中国出口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产品，从而满足了中国因经济规模扩大而产生的货币供应量增加的需要。在这一幅看上去充满活力的时代图景里，清王朝在经历康熙、雍正时期的苦心经营和休养生息后，在乾隆时代迎来了鼎盛阶段。然而“妖术”的乌云正缓缓聚集到了江南的上空。

江南，位于中国的东部与中部，被称为长江下游社会的繁华核心。这个地区高度商业化的经济也使这里农耕区域较少，江南百姓的大量粮食需求都来自其他地区的运输。作为江南财富基础的纺织业依赖于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家庭的手工劳动，江南的市场网络与农民的家庭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个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为了生存，每家每户的每个成员都不得不参与到市场生产中以换取粮食。但一个事实是：稻米的价格对于平民百姓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贫穷和失业不仅困扰着周边乡镇村民，也让商业化的中心地区的一些百姓提心吊胆。

透过“盛世”表面的繁荣，深入普通百姓的生活，我们便会发现在巨大的人口增长压力下社会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再加上大量的人口流动以及四通八达的社会传播，这些都为“叫魂”谣言的萌芽提供了温床。

（二）结构性紧张：民众意识中的盛世

斯梅尔塞认为，人们会因社会结构调整而产生相应的结构性紧张和相对被剥夺感。结构性紧张指使人感到压抑的社会状态；相对被剥夺感是指人们通过与参照群体的比较而产生的一种自身利益被其他群体剥夺的内心感受^②。

乾隆年间的中国，经济确实生气勃勃，然而普通人眼里的乾隆盛世到底是怎样的呢？对十八世纪经济的论述，一个清晰的事实是清王朝在国库充盈的同时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口压力的增长加剧了生存竞争的激烈，尤其是处于贫困底层又在边缘地区的人随时会因这加剧的竞争而失去生存的机会和权利，他们往往不得以被抛入流浪的乞讨队伍中。在十八世纪的道路持续流动的人群里，会看到小偷与乞丐，僧侣与游客，生意人与招摇撞骗之徒，这些不能不对人们的意识产生影响。

在当时一个普通老百姓来看，盛世的繁荣之下，物价在缓慢而持续地上涨，劳动力变得越发不值钱，普通人便需要与更多的人竞争，每一天都不能停下手中的劳动，生活环境变得更加拥挤，治安并不一定更好，大多数人都在焦虑着生存的压力。如果比较幸运地生活在相对富庶的地区，他们或许还能凭借着日复一日地辛勤奋斗维持基本的吃穿用度，但他们难道不会感到

① 何炳棣. 1368-1953 中国人口研究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278.

② 李汉林, 魏钦恭, 张彦. 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结构紧张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 (2).

身处当下社会的不安吗？当越来越多的流民乞丐出现在街上，他们难免会感到害怕，唯恐自己也会被抛入到他们队伍中。为了生存，周遭的一丝风吹草动都会让他们惶恐不安。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民众意识下，谣言的火种一经点燃，将会在普通百姓里以怎样的燎原之势传开。

（三）一般性信念：妖术、焦虑与敌意

一般性信念即群体行为的参与者必须对他们诉求的社会问题达成一般性的共识，出现相似的普遍情绪。结构性诱因和结构性紧张奠定了普遍情绪的产生基础，普遍情绪又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以及群体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般性信念^①。

在传统中国社会，人们相信或说迷信，灵魂是既可以通过自愿的方式又可以通过非自愿的手段而与躯体分离的^②。除了“惊恐”或其他创伤有可能刺激魂脱离躯体外，魂实际上还可能被其他人或某种超自然力量偷走^③。术士被认为是拥有法术的存在，他们的法术能够通过从活人那儿获得精气后再将这精气赋予到其他物体上从而使该物体成为活人的替身，术士便可以操纵替身来对活人造成生命威胁。而这些“替身”通常会与纸片（符咒）、头发、贴身衣物联系在一起。此外，中国人一直很注重房屋的风水，认为风水关乎居住者的气运。因此作为房屋的修建者，建筑工匠被赋予了重望，他们在人们的派生印象里同样拥有某种不可知的法术能力。普通老百姓对这些“信念”的执着实际上暴露了一直困扰他们的焦虑。他们害怕过早离开人世，害怕死后被草草下葬，害怕白发人送黑发人，害怕死后无人给自己祭扫。但这同样反映了当时民众的另一种更广泛的认识：人在世界上的命运很容易受到超自然力量的破坏伤害。

如前所述，乾隆时代人口增长的压力已经明显地表现在中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普通人因为生活竞争的加剧，而对周遭环境的任何一点变动都深感不安。一种晦暗不明的观念在盛世应运而生：人们把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视为危险。

因此面对“叫魂”谣言，他们宁可信其有，不信其无。

（四）触发因素：石匠、和尚与人之贪妒

触发因素即集体行为事件发生的导火索。正是在前三个因素具备的前提下，突发的戏剧性事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真切而敏感的刺激，与已经存在的不安情绪形成共鸣，强化了一般性信念，导致集体行为的爆发。

如前文梳理的谣言生成期中提到的，在1768年初，石匠吴东明承揽了一桩德清县的修建工程。这是一件在当时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事，却被有心之人别加利用了，这得从德清的慈相

① 罗龙女. 价值累加理论框架下的群体性事件解析——以石首事件为例[J]. 领导科学, 2010(20): 20-22.

② 郝瑞. 灵魂概念[M]// 荷恩. 一个中国村庄的死亡崇拜.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73.

③ 郝瑞. 灵魂概念[M]// 武雅士.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和礼仪.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74: 131-182.

寺说起。慈相寺很少有信徒来烧香或做法事，因此施舍也很少，寺里的和尚自是过着穷困的生活。而县城附近有一座观音殿，去观音殿进香的人络绎不绝。慈相寺的穷和尚们妒忌另一座寺庙的香火鼎盛，由此动了一些不端正的心思。和尚们在俗人朋友的“支招”下，利用时下人们对叫魂的恐惧散布了谣言：石匠在观音殿附近施下了邪恶的法术，进香者如果去观音殿不仅不会受到神仙庇护，反而会遭遇不测，如果去慈相寺进香则能帮助来者逢凶化吉。散布谣言的俗人朋友还因此获得了五百个铜钱的酬谢。这个谣言随后不胫而走，并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地更迭版本。正如上文所言，中国传统社会民间迷信建筑工匠在建房时有施法的能力。于是就有了后来农夫沈氏找上吴石匠，求他通过叫魂惩罚自己两个恶毒的侄子。当然这个倒霉的家伙被吴石匠拒绝后扭送至官府挨了一顿杖责。但是借由江南地区四通八达的社会网络，“叫魂”谣言很快传遍市镇乡村的各个角落并持续扩散。在后期查明真相的过程中，军机大臣们通过反复审讯嫌疑犯了解到的慈相寺事件，证实了所谓“叫魂”妖术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生于忌恨的一个谣言。

（五）行动动员：百姓的歇斯底里与各省的清剿

随着事件群众规模的扩大，一般性信念驱动着个体之间相互影响，是他们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逐渐一致。但在行动动员过程中，个人的责任意识在群体行为中逐渐淡化，导致其行为趋向暴力违法。

1768年的“叫魂”事件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普通百姓竭力与凶险不祥的“妖术”进行对抗，他们有的对疑似妖人的可疑者以私刑的方式处死，有的通过请法力更为高强的术士来补救“被叫魂者”。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此有了某种机会来谋取私利。即使“叫魂”的事实从来没有发生过，但人们仍普遍愿意去相信那种可怕又刺激的存在。在这种时候，妖术已经成为一种权力的幻觉。人们开始互相无端地猜疑，蓄意地栽赃。谁还在乎“叫魂”谣言是真是假？谣言已经变成了人们手中肆意利用的获取微观权力的工具。

而在乾隆下令进行全国性的清剿后，各级官僚都在不断让乾隆相信他们在积极追捕妖术案犯。失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妖人”。这时，山东巡抚富尼汉报告说他抓获了一些“妖党”，并声称从“口供”中得知这一切源头指向了江南。乾隆便命令各省向山东看齐，并令江南各省缉拿“妖首”。至此，官员们开始互相比量争先，追缉逃窜的“妖人们”，一场持续数月地对“叫魂”妖术的清剿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制造了无数冤案，牺牲了无数无辜性命。即使这谣言在一些官僚看来如此荒谬。

（六）社会控制的疏忽或失效：帝王与官僚的运作

社会控制能力，在此主要指政府对突发情况的应对能力。政府对社会实行严密有效的控制是遏制群体行动的关键，当这种控制能力减弱或失效时，群体性事件将得以发生。从这个意义

上说,该因素是决定性的。

谣言初期,基层官员为了息事宁人对叫魂案件的处理是对原告施加惩罚(如杖责等),并在被告确实无“叫魂”行为的情况下予以释放,通过这样的做法警告民众里草率无根据的言论和违法的暴烈私刑。省里的官僚对于管辖范围内的“叫魂”案件出于责任而谨慎对待,但对困扰百姓的“叫魂”妖术本身却并不重视,出于精英主义的傲慢,官僚阶层对民众的迷信予以蔑视。然而对妖术谣言的恐惧依然深深留存于民众的内心里,民众并未受到恰当的保障。

叫魂危机最初的两个月,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皇帝报告过地方上的妖术恐慌。乾隆仍通过内线了解到一些相关情况。虽然乾隆皇帝只是一个人,但他代表的却是清朝帝国的整个制度;或者说,他是这种制度的人格化^①。不管他是否真的相信妖术的存在,在他眼中,涉及“辫子”这种关乎满人统治“合法性”的政治要素是极容易让他怀疑有人利用剪辫妖术挑起叛乱。所以他一得知各地的叫魂案后便发动了清剿,同时也想对这样一部“腐化”的官僚机器加以整肃。至此,皇帝与各省巡抚以及各省巡抚之间各自展开了较量。官方大动干戈的清剿非但没有遏制谣言的传播,反而让民众更加恐慌。子虚乌有的“妖人”出现在一桩桩线索混乱的冤案里。民众在妖术恐慌中,也丧失了对官府的信任。在失效的社会控制下,“叫魂”事件相应达到高潮。

四、对现代社会谣言防控的启示

1768年爆发的“叫魂”事件距今已经过去两百多年,无论是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都早已今非昔比。尤其是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让谣言的传播特点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谣言发生的频率更高了,扩散的速度更快了,传播的范围也更广了。但引发“叫魂”谣言产生及扩散的原因中,民众因频发的社会事件而生的不安情绪以及官方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是一直存在的。随着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世界各地因疫情引发的恐慌让谣言一时蜂起。本文将以史为鉴,结合现代谣言传播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在疫情常态化下现代谣言的防控策略。

(一) 提高公众媒介素养,适时疏导社会公众负面情绪

1768年“叫魂”事件中,叫魂恐惧是由下至上爆发的,普通平民百姓相信了不实的妖术谣言,因谣言引发的恐慌也让他们神经紧张,更容易激化矛盾。虽然我们不该一味地指责底层百姓的愚昧,但是在网络传播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几乎每天都会面临层出不穷的网络谣言陷阱,稍不留神便会被谣言蒙住双眼,因此全面提高公众媒介素养是势在必行的。媒介素养是指人们

^① 刘昶. 盛世危言——〈叫魂〉读解[J]. 史林, 1999(2).

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①。公众媒介素养的提高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与合作。政府应推进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构建和落实，其中针对特殊对象如银发族、偏远地区的人民应制定相对应的教育计划。此外，网络谣言盛行不能仅靠道德力的约束来治理，这亟须网络法律规制的强制治理。媒体自身也需要遵守媒介伦理，同时也应尽力向受众普及相关信息传播知识。此外，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当下社会各类谣言折射的情感取向，如果谣言本身反映的是公众对社会生活的不满情绪，官方应及时疏导，进而削弱谣言传播的危害程度。

（二）消除官方与民间的信息不对称，打通舆论场间的鸿沟

1786年“叫魂”事件中，官方知晓的信息和民间了解的信息在内容上出现了多次变异，导致互相对对方的行为作了错误的解读，进而引发了多轮谣言的扩散。这对于现代社会的谣言防控同样具有启示意义。正如原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提出了“两个舆论场”概念。如今新媒体构成的民间“舆论场”与主流媒体构成的官方“舆论场”之间存在较大鸿沟。增强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互动”，推进媒体融合，让两个舆论场在对立中走向统一，是打通两个舆论场的根本途径。对于政府而言，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改进管理和服务工作。官方舆论场通过发挥自身媒体的优势，积极争夺主流舆论引导权，让信息的来龙去脉得到完整的呈现，从而使断章取义、谣言在报道中不攻自破。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之间应合力针对舆论热点对公众进行有效信息的传达。只有这样，才能填平官方与民间的信息鸿沟。

（三）高效把握辟谣时机，建立针对性的预警机制

1786年“叫魂”事件中，引发谣言不断大规模扩散的一个重要原因即社会控制的失效，错过了打击谣言的时机。把握辟谣的时机对于控制谣言传播是相当必要的。如2020年上半年日本因卫生纸不足的谣言发生了大规模抢购卫生纸的现象，即使一段时间内官方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发布了辟谣信息，但是因为错过了辟谣的最佳时机，仍让抢购行为持续了数月，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②。因此，官方在打击谣言之际，务必及时、全面地呈现事情的原貌。政府部门应第一时间主动联系媒体，协调并引导媒体进行报告，一切以官方通报为准，尽可能全面地报道事件的缘由。此外，类似谣传物资即将缺乏而引发大规模抢购这样的事件具有频发性，如2011年3月中国即陷入过一场著名的“抢盐风波”，其起因就是关于“食用碘盐可以预防核辐射”的谣言。因此在同类型的谣言反复袭来前，官方可建立针对性的预警机制，利用先进技术加强

① 张志安，沈国麟. 媒介素养：一个亟待重视的全民教育课题——对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回顾和简评[J]. 新闻记者，2004（5）：11-13.

② 福長秀彦.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拡大と流言・トイレットペーパー買いだめ[J]. 放送研究と調査，2020（7）：2-24.

对社会谣言的监测，以达到控制谣言的目的。

五、结语

两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议起“叫魂”妖术下意识会觉得荒谬可笑，可是类似的“需要活人某种器官、灵魂”来“满足坏人的欲望”的叙事结构的谣言，从封建制度社会的“叫魂”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谣传苏联需要割男性睾丸造原子弹^①，再到互联网时代的偷肾脏，一直在反复出现。某种意义上而言，谣言和病毒一样，无法根绝，会长期与社会共存，并抓住类似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机会，冲击社会，感染传播者。如果我们觉得“叫魂”妖术的谣言显得愚不可及，那我们仍然容易掉入过度自信的陷阱，因为近年来新的谣言仍层出不穷：2007年“西瓜注射红墨水”差点摧垮长沙绝大多数瓜农、2011年“响水氯气泄漏”造成数万民众连夜逃亡，还有著名的2011年“防辐射全民抢碘盐”事件。最近一个10年里，蔓延多地、屡禁不止的大规模破坏性谣言因为社交媒体的兴起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也因为社交媒体的出现提供了更快捷更多元的传播渠道，小范围、针对性强的谣言更加层出不穷，尤其是当社会事件、刑事案件发生后，围绕具体事件的具体谣言使辟谣工作更难进行。

一味地指责轻信了谣言的民众容易使我们陷入精英主义的傲慢，谣言的一个狡猾可怕之处就在于它往往会伪装成“荒诞”的模样。谣言爆发时，惩罚恶意传谣者是必要的，提高民众知识素养是正确的。而只有我们深入了解了谣言传播背后的机制和原因后，才能更好地预防类似谣言的发生与传播。

^① 李若建.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J]. 国家历史, 2008(2).